

就中国的当代艺术而言,正在进行一种悄然的变化,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必须面对各种不曾有过的转变。如创作主体、展览机制、传媒、艺术市场等等。在一次研讨会上,本文作者与海外华人艺术家黄永砅先生就国内双年展作了一次访谈。

俞可(以下简称俞):前些日子上海双年展组委会因你的作品《沙的银行或银行的沙》反映出此次展览暗含的主题,而授予你这次上海双年展奖,但你对获奖则表现出异常的冷淡。就我看来,上海双年展在中国可谓学术性较强的艺术展览,所以奖项的颁发应该是严肃的,进一步讲,颁奖是对创造者努力工作的一种认可,获奖者应该高兴才是。

黄永砅(以下简称黄):在双年展的开幕式上,我正与别人谈话,突然来了两人把我架走了。我有些诧异,我没想到突然间我获奖了。我认为颁奖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这种方式,也许对媒体倒更重要些。坦率的讲,作为艺术家,或者说是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质疑这种颁奖制度。因为这里面,它对创作带来一些问题,获奖是策展人的标准,还是形而上的一种普遍要求,标准的成立它就会构成一座假的金字塔,这金字塔并不与艺术家自身的创作构成联系,所以它就不能反映出当下文化的真正需要。

上次的“诺贝尔文学奖”就闹得有点奇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使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萨特,他曾经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拒绝领奖,拒绝是要有理由的,萨特的拒绝是为了建构他认为一种更为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个拉美的文学家(名字我记不起了),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没拒绝,他拿了,因为他们很难有机会,但他在演讲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有了一个机会来发言,来表明我的观点”,有机会来发言,这点很重要。因为人总想阐明自己对事物的看法,这使我想到萨特为什么拒绝,首先他是西方人,他有更多的机会,他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所以他反对这个机构,他是从机构这个角度来表示自己的态度。还有就是,大家普遍对“奖”都表现出无所谓,那就不会成问题,但问题是,颁奖者认为这是一种权威,他可以主导某种创作趋向,这就太可笑了。

黄永砅近影



质疑是一种责任

——专访艺术家黄永砅

◎俞可

俞:就目前现状而言,作品是否获奖,对很多艺术家来说,还是很关注的,尤其是中国美协主办的全国美展,从大城市到小地方,专业和业余的都积极参加这项展览活动,而全国美展所设定的金、银、铜及优秀作品奖更加成为了大家竞相努力的目标。所以部分画家在美展前的准备工作中,总是猜测评委们是那些人选,他们的思想趋向是什么,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可能就会对艺术本身所应思考的问题构成影响。

黄:我们艺术家应该在奖项面前,表现出一种平常心态,这很重要,因为艺术创作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这里代表着责任和理想,而我认为奖项的获得,偶然因素很多,也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读,我们应该想到大大小小的奖项,是不是真正促进了当下艺术的发展,我们是否能做一些更为实际的工作。

俞:对当下的艺术奖项产生质疑,我认为这对今后展览的组委会和艺术家作用都是积极的,的确应把艺术权威放在艺术建构的后面,而认真加以考虑。还有就是我得转到另一个话题,作为双年展的参展者,同时你在法国呆了多年并参加过国外非常重要的展览,你是怎样从一种有参照的角度来看国内双年展。

黄:过去我们国内的展览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写实的官方艺术,另一个是非官方的,如行为,装置,影像等地下艺术,这简单的划分是非常可笑的,这反映出我们过去对待艺术的态度,现在不同了,国内的双年展不分官方和非官方!这为中国未来的艺术展提供了新的模式,中国艺术家也有了更多的实验机会,这对中国的艺术发展无疑是有促进

作用的。

俞:说到积极的方面,答案是肯定的,你不认为架上,架下和风格样式上的过分差异,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相互之间在并置上的尴尬,而观众也对入选的有些作品,颇感意外。

黄:国内双年展把绘画、装置、影像放在一起,这也许反映出中国的国情,同样,也反映出艺术行为的相互平等,平等在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这非常重要。这样也为中央和地方美术馆参照有了一个范例,如果持续下去一定会促进这些美术馆朝着更加专业化方面去发展,我们国内的艺术家也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俞:架上绘画历来在中国占有主导的位置,而这次双年展在架下作品的影响下,架上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对观众的影响,明显势弱,你对双年展的架上作品怎么看。

黄:我说过,这里有一个平衡的因素,这是现实,在此时此刻办这样的展览,必须要有架上绘画,必须考虑到架上绘画,如果从另一角度看,部分艺术家他只能在架上反映他的创作思想,他不会因时尚而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式,这还是一个老实的态度,但作为艺术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它都有这个时代的特征,社会在改变,生活也在发生变化,世上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你可以认真地研究十九世纪的绘画,你也可以参照这风格画得很好,但这毕竟是十九世纪所烙下的特征,这和我们今天所体验的一切是两回事。所以,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得努力地去关注一些问题,了解所发生的一切,来促进我们思想的转变。

俞:每次双年展外有着大大小小的外围展,如“不合作方式”、“异常与日常”、“自然之泉”等这些展览基本上由年轻的艺术家作品所构成,他(她)们在观念、材料、以及创作样式上有着很强的叛逆精神,在圈内引起不小的反响,策展人和青年艺术家试图部分地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双年展的看法,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这些外围展是对双年展的丰满。

黄:这些展览我也看了,参展都是年轻艺术家,我曾经也是这样过来的。但问题是人们在说话时都有一个背景,也存在一个自己的利益,所以评判事物时就带有这些因素,我生活在法国,同时也是双年展的参展者,我说这不行那不行,显然不具有说服力,但我们排开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谈点东西,就说关于合作与不合作,我们就可以提问题,跟谁合作,跟谁不合作,在什么状态下,产生的不合作。中国当代艺术要避免一种趋向,就是被西方人看作是表达不同政见的艺术,我在国外呆了这些年,我是深有体会的,西方人很容易把帽子放在你的头上,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艺术,很容易被西方人所误读,有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我们设置圈套,所以我们应该多想一想。

俞:这些外围展,按有些评论家和艺术家的说法,“外国人的口味”和当下“文化身份”的这个话题,不时地影响着我们对今天前卫艺术创作的审视,同时也引起我们对我国自身艺术发展的思考。从艺术史的发展来判定当代艺术已经部份地说明了问题。但从另一角度讲不同文化的差异所形成的多元格局,应该是我们要坚持的,所以中国当下的艺术创作也应呈现出自己特有的文化背景,背景对我们今天是不是很重要?

黄:我在国外参加过很多艺术活动,回过头来看国内的这些艺术创作时,的确能看出很多别人的影子,当然青年艺术家很难摆脱别人对他的影响,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人能在没有影响的情况下搞创作,我也是在前辈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但艺术家对于自己的创作应尽量诚实,尽量地摆脱别人的影响,或者抹去这个影响,现在国内的很多艺术家搞作品,的确有太多别人的影子,模仿多了,思考就会少。

俞:我想中国当代艺术有它的特殊性,正因为它的背景特殊,它才必须经历这样一个旅程。

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经历过模仿、学习的旅程,而且这个时间还相当长。问题是,艺术家要清楚,自己的作品还有模仿的因素存在,作为艺术主持人和批评家也应该看到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狂妄自大,这样我们才能游离模仿,生长出自己的东西。

还有就是,艺术家应更多地拿出自己新的作品,最好有针对性地为某个展览而创作,展览本身是为了建构出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文化,反过来对艺术家本人也是一种促进,促进就必须冒险,双年展不应该把现有的成果拿来展览,要区别于艺术博览会,把一些现成品拿来推销。双年展是一个大的实验场所,艺术家把正在做的、想做的、将来准备做的投入到里面,这样才能是当下文化所直接反映的东西,这样才有活力,才会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当代艺术形成影响。



鹤足鹿迹 黄永砅 装置